

# 不要唱经济与环境双赢的高调

诸大建

2011-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期间,万元GDP的能耗被设定为五年内减少16%,这意味着每年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生产量有平均4%左右的增加。其中,对于增加了的4%左右的污染产生量,需要投入占GDP4%的污染治理费用,才能够保持环境质量状况不退化,而不是达到更好。

然而,我们的实际状况比以上的设想要严峻得多。一方面,我们的GDP总是希望能够有高出7%甚至超过两位数的增长,即不到7年就可以翻番;另一方面,我们的产业转型和技术进步却达不

到每年提高4%,污染治理也没有达到每年不低于3%的投入(像上海这样每年在治理污染上有占GDP3%的投入,在国内是不多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去30年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资源环境状况在变得越来越差;我们的经济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二,我们的环境恶化状况却达到了世界第一。而治理过去30年的环境恶化欠账,至少需要耗掉过去30年获得的经济增长的90%。

由于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想

要很高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没有任何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如果想要很高的资源环境质量,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因此,我们的决策层需要科学地对待环境与发展的冲突问题,而不是唱高调空喊所谓的“双赢”。真正符合生态文明的做法应该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源环境影响方面,保持一个可以接受的匹配水平,把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自然环境门槛之内,而不是追求超越极限的经济增长。(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 新民时论

经常看到政府官员拍着胸脯说,发展可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每当在这种场合,作为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学者,总是为他们捏一把汗,因为这样的口号常常会被严峻的事实击垮。当下中国大地上的严重雾霾已经证明了相反的状况。这里,可以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经济年增长超过两位数的时

PAT,来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的关系。这里,I表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影响,P是人口总量,A是人均GDP,T是技术进步的

例如,我们的经济增长要在10年内翻一番,即每年增长7%,如果没有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方面重要的技术进步,以及末端导向的

污染治理,那么由此导致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也会翻一番。这就是有了金山银山,没有了青山绿水。反过来,如果我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每年增长7%的同时,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的速度要等于或大于7%。等于7%,就是经济增长翻番的同时,环境影响保持十年前的水平,没有恶化;大于7%,就是资源环境的状况比以前变好了。

按照国家公布的发展规划,GDP年增长被设定为不小于7.2%,技术进步被设定为每年有3.2%左右增加,例如

## 不准狂欢

任大刚

### 结舌者言

一个沉溺音乐的文艺范儿,必为人所高看三分。但韩非子却不这么看。

话说卫灵公到晋国作国事访问,路上听到一段稀罕的音乐,让随行的乐师师涓记录下来。见到晋平公后,在欢迎宴会上征得晋平公同意,请师涓演奏一番。

谁知还没演奏完,在座的大音乐家师旷连忙制止,说这是“亡国之音”,不可再奏。晋平公问是何原因,师旷答道,这是暴君殷纣王喜欢的柔弱、颓废音乐(靡靡之乐)。谁听了这支曲子,谁的国家就削弱,不要再演奏了。

但晋平公不以为然,称自己一生只好音乐,要求继续演奏。等师涓演奏完,晋平公问,这首音乐叫什么?师旷回答说叫“清商”。晋平公又问,还有比清商更动听的音乐吗?师旷答道,那就是“清徵”。晋平公很想听清徵,师旷连忙制止说,德行很高的君王才能听清徵,您德行还不够不上,不足以听清徵。晋平公再次称自己一生只好音乐而已,一定要听。

师旷不得已,只好援琴而鼓。刚开始演奏就不得了,有十六只黑仙鹤从南方翩然飞来,随着演奏,列队,延颈而鸣,舒翼而舞。这可把晋平公乐坏了,亲自给师旷敬酒。又问还有比清徵更动听的曲子?师旷说,有,是“清角”。晋平公道,那就演奏一番。师旷道,古时候黄帝在泰山上召集鬼神聚会,坐着象车,赶着六条蛟龙,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排场浩大才演奏清角。现在您德行浅薄,听不了这首音乐,听了恐怕要坏事。

但是晋平公根本不听。师旷只好演奏。结果音乐声起,便是乌云翻滚,狂风暴雨纷至沓来,帷幕被风撕裂,食器打翻,屋瓦坠落,宾客四散逃走,晋平公惊恐万状趴在

廊道上从此身体瘫痪。此后晋国遭受三年大旱。

韩非子讲述的这件事,离奇而近乎扯淡,却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人有没有(借音乐)搞娱乐活动的权利?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其实孔子也持类似态度。《论语·卫灵公》载,弟子颜渊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国家。孔子专门谈到要听《韶》、《舞》这样的音乐,而不要听郑国的音乐,因为郑国的音乐淫邪不健康(郑声淫)。不惟音乐不能具备娱乐功能,连参加跳舞的人数都要严格限制,遑论联欢狂欢,否则“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坚决杜绝大哭大笑和肢体奔放(西方文化中叫做“酒神精神”)的文艺规范,通过“以史为师”的长期浸淫,逐渐将中国人塑造得内敛、拘谨,在汉民族最大的节日——春节,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些文艺活动,形式上与国际接轨,但是在奔放、欢庆的表象之下,是节目的长期筹划、排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实质上内敛拘谨到极致。

民间节日活动亦复如此。笔者春节期间在某大城市观过一个政府主办的“大庙会”,在一个大广场上,分别观看了少数民族青年的情歌对唱、俄罗斯美女的曼妙舞蹈、肌肉男的力量表演和太阳马戏团多国退役队员的空中翻转,台下围着黑压压的观众给出稀稀拉拉的掌声,有的节目连礼节性的掌声都没有,显得这些歌舞杂技表演似乎与己无关。

中国人的节日一般以“吃”为主题,春节尤甚,当“吃”不再是问题时,人们从饭碗里抬起头,开始抱怨节日气氛越来越淡——城里的节日街头,冷冷清清;乡下的家人团聚,围在一起搓搓麻将了事。有钱的游走在异国他乡。是啊,长达2000多年不准狂欢,还能积淀出什么让人精神亢奋,血脉偾张,流连忘返的传统?

## 文化的运数

朱绩崧

### 北窗絮语

近读某新媒体对上影导演江海洋先生的专访文章《今日文化不能承受之轻》,不禁思考起文化的“运数”。

说“运数”,并非诉诸“天意使然”的无力借口,而是强调文化风尚的嬗变与社会发展实在有着莫大的关系:如表与里,同果连因。我们处于社会生活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某些文化品类,因为跟不上节奏,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时,我们应该去研究这些文化品类为何滞后甚至衰落呢,还是责问时代前进的趋势呢?

这种趋势对文化的影响,最受诟病的有两点:一是追求经济效益导致文化衰退,二是追求快捷方便导致文化衰退。但这两条控诉,很难站得住脚。经济效益和快捷方便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目的,若文化因之而“衰落”,恐怕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假象,无可否认的真相则是文化深受外界影响的促动,加速了新陈代谢。

追求经济效益,不单是好莱坞的做派。思南路、长乐路走走,多少深藏绿荫的洋楼别墅是昔日沪上文化奢侈的寓所?写好书,画好画,唱好戏,为广大读者、艺术爱好者认可追捧,名利双丰,绝非当代特有。当然,古往今来也不乏为谋财抢眼而自甘走下三滥路数之辈,可他们的历史地位是低是昂,皆有公论凿凿。综观之,凡能顺应时代洪流者,今必蔚为宗工巨匠;徒以擦擦欲求而博取名利者,今或湮没无闻,或遍遭鄙夷。这是时代洪流的“自净功能”,不劳杞忧。

追求方便快捷,对文化的兴旺更是利大于弊。

以我十五年来专业见闻为例,早先那批学生读英文,去课堂要背上厚重的词典;本世纪初,电子词典开始流行,中低端的有文曲星、好易通,高端的有卡西欧,很快取代了纸质词典——“词典”这个名词前,加上定语“纸质”,本身就意味着兴替;这几年,大学里,电子词典也不多了,手机、平板电脑的App尽占上风,App里查不到的,还能上网搜索。“查词典”这一语言知识获取的主要方式竟一变再变,不仅不能按词形查音义例,更能于数秒间,将整部工具书的特定内容罗列齐全,这在纸质词典统治的数百年间无法想象。

江先生认为从毛笔到钢笔到圆珠笔到键盘,是方便赶走美的过程。我倒觉得,这种方便本身未必不是一种美,这美固然不体现在个人书写风格的展示上,但就人类文明内部信息沟通效率激增而论,如此宏观之美,下仓颉造字一等而已。

面对书道式微、梨园希声这类突出的“衰落”现象,因相关文化品类的生态为科技发展、风俗变易严重破坏,当务之急乃在守旧,不在创新。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早做好考古型的整理集藏工作,以俟后世有缘重温风雅之原貌,如此“安乐死”实在好过胡乱改编、勉强转型的“强心针”。

文化的运数,就是因循以起,顺势而为,方能长葆活力。这样的领悟,在我看来,恰恰是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所谓“海派文化”的真谛。海派文化最不需要的,就是留恋。那些至今还陶醉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雪月风花的人,还有那些斤斤计较“帝都”、“魔都”孰雄孰秀的人,离海派还远着呢。

## 面对冯小刚式的困惑

李泓冰

### 余热录

全民都在吐槽冯氏春晚,也包括他炒幽默冷饭的贺岁片《私人订制》,原本是一笑了之的,看了一篇关于冯小刚的专访,于其心有戚戚焉,笑不起来了。

原来,春晚也好,《私人订制》也好,冯导都是为了还那部悲凉之作《1942》的债。《1942》,讲述中国大饥荒的故事,是冯小刚酝酿了19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自认是一生事业顶点,业内也有人誉之为最出色的中国电影,但是票房一片惨淡,同时上映的搞笑片《泰囧》却一路飘红成了票房冠军。据冯说,为了补华谊在《1942》上的窟窿,冯拍了《私人订制》;为了还《1942》欠下的人情,他应下了春晚导演一职。冯小刚很悲酸,“我随随便便拍的电影,一个星期卖4个亿。我认真真拍的电影不卖钱,这让我有了很大的困惑”。

这当然不是冯导一个人的困惑。这困惑还将没有尽头地持续,固然有黄钟委地瓦釜雷鸣式的传统悲愤,更有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当代浮躁。

这个时代面对的是怎样一群难以讨好的中国观者呢?

是的,观者。观影者不再是蜂拥着走进或离开影院、让冯导们看不清面孔的模糊“观众”了,更多的时候,观者不再成群结队,而是独自在暗夜里打开网络观看各种节目,边看边冷冷地、酷酷地或激动地在网上敲下几行字,表达喜怒哀乐,这些匿名议论常常是讥讽式的,懒得负责任。收视率很高的作品,也可能恶评如潮,打分极低。甭管谁的心血之作,观者们没空去解读去琢磨,只想被逗乐、被愉悦。

忆苦饭显然没有拥趸,而“炸鸡加啤酒”才是观者的心头好,这成了眼下顺理成章的文化景象。早年那种全民抹着眼泪读小说《伤痕》、看电影《天云山传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不独是电影。也不独是中国。这个时代的观者难以耐下性子专注任何一件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从头到尾细读完一本非情节类书籍了,很久没有过一顿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饭了,很久没有过一段不急不缓的旅行了,很久没有过一次不被手机屏幕闪烁的提示打断、与老朋友的促膝谈心了……

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时代。观者们可以和曾经高高在上、独揽话语权的冯导们毫不相让地对骂;对众多社会事件,人人都有麦克风,理论上能让所有人听见;创业门坎变得很低,身边的张家二小子、王家大姑娘,可能转瞬之间就成了被风投盯上的某个积累可观粉丝的客户端创造者……

这也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时代。人人急于发声,人人都懒得互相倾听。热衷于拍下自己吃的每一餐发到网上,却没有耐心打开一本略嫌厚重的书籍;载体无数,却内容苍白;观者太多,却乏人行动;点赞轻而易举,却鲜有一个付诸情感的注视。

这个时代,我们心绪复杂地看它蛇行而前,一筹莫展。作为观者,将如何自处,这绝不仅仅只是冯导的困惑。人类不曾经历的,我们正在经历,只是没能来得及停下来思考,谁在思考或仅仅是作思考状,发笑的不是上帝,而是无数观者。

可是,仅仅只有一种表情,久了也会淡漠的吧,彼此都会恐慌的吧。会不会有一天嚷嚷得累了,开始注视委地已久的黄钟呢……